

波上空投撒伤寒、霍乱、鼠疫菌；10月4日在衢州、22日在宁波飞撒细菌；11月和12月又在金华、上虞、汤溪等地投撒细菌。1941年春，石井细菌部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，派出第二批远征队，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，开始时为60人，后增加到100余人，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。远征队在湖南常德一带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，引发该地区鼠疫流行，死于鼠疫者达400多人。4月21日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，11月4日在常德市区投撒鼠疫菌，12月19日，日机在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。

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西细菌战大揭秘》一书披露，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.75万人。该书作者崔维志引用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的“十八秋鲁西作战”，讲述了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一起，于1943年（日本昭和十八年）8月至9月间在华北进行细菌战的细节。其中，投放“虎列拉”（霍乱菌）的地点不止山东，还包括北平周边、河北、河南等地。

林茂美供述：“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，于1943年8月至9月间，在馆陶、南馆陶、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。当时散布在卫河，再把河堤决开，使水流入各地，以便迅速蔓延。……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，再派人散布的。”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《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》的笔供中交代：“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，现承认这一罪行，并表示认罪。”

最新披露的证据，来自俄罗斯

美国不仅效仿了石井四郎的人体试验，在朝鲜战场，美国实际上也使用过细菌武器。

方面。“日本人不仅在撤退时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，还积极在攻击中使用它们……投到水井、河流中。危险的是，这些河流汇入苏联边境的河流，并且水流当然是以冲刷我们一侧的方向流动。这是破坏性的攻击，是最自然的细菌战。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31日公布了对俄罗斯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副所长、俄罗斯功勋律师亚历山大·兹维亚金采夫的采访内容。兹维亚金采夫称，日本军方在中国留下了饼干、面包、糖饼和巧克力，这些食物都被致命细菌污染。在中国的一次破坏行动中，第七三一部队所谓“教育部门”的代表古都良雄向中国战俘分发了3000个事先用伤寒菌污染的面包。

尽管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，有关于古都良雄此般劣迹的记载，可兹维亚金采夫提供的则是来自伯力审判现场的实证。

伯力审判，即哈巴洛夫斯克审判，系在1946年至1948年东京审判以后，苏联组织军事法庭就日军在战争期间“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”的罪行，进行的一次审判。这次审判，本身就是苏联方面对英美主导东京审判，未彻底清算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一种补充审判。兹维亚金采夫称，古都良雄在伯力审判期间供认了罪行，还承认：“感染者返回并传染自己的城市。并且他们都在抽搐中死去，所有人、整个整个的家庭都在痛苦中死去。”

## 实战后，谁移植了恶之花

伯力审判之所以成功进行，原

因在于——尽管一再遮掩，甚至从背荫河镇搬迁到平房地区，但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存在，早在二战期间就已经走漏风声了。恰如石井四郎本人所担心的——在“中马城”暴动中出逃的12人中，有一位名叫王子阳的人，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长为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师代师长。1937年3月，在木兰县的一次对日作战中，王子阳牺牲。不过，此前，他已经将情况披露出去：“里面关押的大部分是爱国志士，在‘中马城’吃得好，大米白面，但是就是隔几天就有穿白衣服日本人抽上一大管血，直到最后支撑不了，仍被强制抽血，然后被送进焚尸炉焚化。”

1936年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团团长刘海涛（化名张富民）曾据王子阳的说法，在共产国际揭露日本政府任意践踏人权，肆意违反国际公约，在中国东北境内设立细菌实验工场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。

当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进入日本侵略的中国东北时，石井四郎已经逃离。在美军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，石井四郎接到了日本高层“销毁秘密”的命令。他先期让妻儿逃回日本，自己主持了摧毁细菌部队相关设施之事。然后，也悄然潜回日本。本来，他该出现在东京审判的受审席上。然而，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审判，这位在战争结束前已经晋身日本陆军中将的侵华恶魔，竟然完全没有出现在人前。

并不是鬼使神差，而是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刻意将他“保护”起来。据石井四郎之女晴美后来披露，1946年初，美国军官初次找上门来讯问她父亲的工作时，用她做